



# FOCUS

# 高层动态

2021年7月12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mailto: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 本期目录

<b>最新动向</b> .....	3
【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3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李克强：进一步推动医保服务高效便民】.....	6
【韩正：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7
【孙春兰：加大力度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让更多群众享受改革成果】.....	8
【胡春华：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贡献】.....	9
【郭声琨：强化督导成果运用 不断把教育整顿引向深入】.....	9
<b>问题探射</b> .....	10
【当前金融体系已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10
【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障碍与政策建议】.....	14
<b>人物关注</b> .....	19
【湖南省副省长朱忠明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19
<b>智囊高参</b> .....	20
【周维富：加快建设现代区域发展体系】.....	20
【卢锋：透视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	22
<b>虎视寰球</b> .....	26
【冒险解封 英国为何这么急】.....	26
【缩减 QE 意见不一 美联储在犹豫什么】.....	27
<b>华夏透视</b> .....	3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	30



##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 【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7月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是为了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是一场需要保持顽强斗志和战略定力的攻坚战、持久战，要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统筹考虑和谋划，以更加坚定的思想自觉、精准务实的举措、真抓实干的劲头，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扎扎实实成效。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站在保障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高度，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抓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工作。要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决策部署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扩大内需、推动绿色发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局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不少需要抓紧解决和克服的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选取真正的重点堵点难点集中攻关，打好攻坚战和组合拳，以重点突破带动引领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要把满足国内需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更多关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推动部门高效联



动、区域协同发展。要加强统筹指导，督促地方和部门找准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新发展格局，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能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要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应对重点领域潜在风险，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

会议指出，近些年，我国种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种业发展基础仍不牢固，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粮食安全这根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绷得更紧。

会议强调，要打牢种质资源基础，做好资源普查收集、鉴定评价工作，切实保护好、利用好。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南繁硅谷等创新基地建设。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突出问题要重拳出击，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做好长远规划，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大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建设。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开展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青藏高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脱贫攻坚，有效遏制了青藏高原生态恶化趋势，促进了区域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严守生态安全红线。要坚持绿色发展，立足青藏高原特有资源禀赋，找准适宜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出一条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守好底线，妥善处理、防范化解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类风险，切实维护边疆安宁和团结发展的良好局面。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部署设立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推出了一大批高水平制度创新成果，建成了一批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加强改革创新系统集成，统筹开放和安全，及时总结经验并复制推广，努力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园区，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据新华社）

[Top](#)

###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6 日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强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为主题。



峰会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金色大厅内，中国共产党党旗与参会的外国政党党旗交相辉映，呈现出壮观的党旗旗阵。会场上设置了五幅巨大的显示屏幕，充分展现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共聚“云端”、共谋大计、共话未来的生动场景。习近平首先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方向，担起历史责任。

第一，我们要担负起引领方向的责任，把握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第二，我们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第三，我们要担负起促进发展的责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任何以阻挠他国发展、损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的，也终将是徒劳的！

第四，我们要担负起加强合作的责任，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我们要坚持科学施策，倡导团结合作，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共同扎好安全的“篱笆”；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要勇于担当、同心协力，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第五，我们要担负起完善治理的责任，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我们要加强交流互鉴，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

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沟通，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将履行大国大党责任，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贡献。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各国政党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愿为人类减贫进程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将全力支持国际抗疫合作，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将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我们要共同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各种行为。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将坚定不移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南非非国大主席、总统拉马福萨，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阿根廷正义党主席、总统费尔南德斯，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特尔特，柬埔寨人民党主席、首相洪森，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兼第一书记、总统姆南加古瓦，巴勒斯坦法塔赫主席、总统阿巴斯，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总理伊姆兰·汗，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总统纽西，纳米比亚人组党主席、总统根哥布，刚果劳动党主席、刚果（布）总统萨苏，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袖、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前总统莫拉莱斯，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总书记、首相奥斯曼尼，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席、总统基尔，社会党国际主席帕潘德里欧，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等在峰会上致辞，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平凡的历程，热情赞誉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各领域取得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政策主张，表示政党应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幸福的世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祥、杨洁篪、杨晓渡、陈希、黄坤明、蔡奇出席峰会。来自 16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出席会议。100 多个国家的政党在本国共设置了近 200 个集体会场，组织本党代表集体参加此次峰会。上海、陕西延安、广东深圳、福建宁德、浙江安吉等地设置了国内分会场，地方部分党员干部同步收看峰会盛况。峰会发表共同倡议，表达与会政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望。（据新华社）

[Top](#)

### 【李克强：进一步推动医保服务高效便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推动医保服务高效便民；确定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若干政策措施；决定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推出支持碳减排的措施。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有利于更好保障群众健康、提升获得感。会议确定，一是重点面向数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等群体，加快推进住院、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确保今年年底前各省份 60%



以上的县至少有 1 家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机构、明年底前每个县至少有 1 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二是优化定点医疗机构总额预算管理，推进现有试点形成经验，抓紧推广。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医药机构，做到一视同仁。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医保服务，丰富保险品种，提高医保精算水平。规范和压减医保支付自由裁量权，防止医疗机构年底突击“控费”。三是统一规范和优化医保办理流程，简化办理环节和材料，推行医保报销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办成。依托“互联网+”，实现医保服务“网上办”、“掌上办”。四是强化全过程监管，完善法规，依法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诱导住院、虚开发票、滥用药物等行为，守好用好群众“保命钱”。

会议指出，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和群众收入。会议确定，一是适应新就业形态，推动建立多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系。对采取劳务派遣、外包等用工方式的，相关企业应合理保障劳动者权益。二是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督促平台企业制定和完善订单分配、抽成比例等制度规则和算法，听取劳动者代表等意见，并将结果公示。不得违法限制劳动者在多平台就业。三是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等行业为重点，开展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四是建立适合新就业形态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贴。五是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

会议决定，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有效性，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同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设立支持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的发展，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在试点基础上，于今年 7 月择时启动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下一步还将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以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据新华社）

[Top](#)

### 【韩正：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7 月 6 日在济南主持召开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前，韩正专门要求生态环境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力量，历时近 3 个月、覆盖 52 个地市、行程近 30 万公里，深入沿黄 9 省区开展暗查暗访暗拍，编辑形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对黄河流域进行了一次专业化的“体检”。会上播放了警示片，沿黄 9 省区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观看后作了发言。

韩正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和治理黄河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沿岸省区发展情况，并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努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韩正指出，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首先要看到问题，看不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水资源严重短缺，要全面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要求，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取水用水。要加快绿色转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着力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加强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严肃处理侵占或损毁文物古迹的突出问题，切实加强黄河流域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

韩正强调，要狠抓问题整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落地生根。要创新工作机制，发现问题要创新机制，解决问题也要创新机制。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省区要传导压力，把整改任务落实到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责任部门。要加强督办和指导，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确保整改取得实效。要依法严肃处理环境违法行为，破解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要因地制宜补上制度漏洞，在推进整改中加快完善规划和政策体系。要鼓励社会和公众积极参与，加强媒体、群众等各方面监督，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据新华社）

[Top](#)

### 【孙春兰：加大力度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让更多群众享受改革成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7月7日至8日在福建厦门、三明调研医改工作并召开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座谈会。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福建时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力度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进一步拓展“三医”联动改革成果，更好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

孙春兰指出，三明是全国医改的“排头兵”，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近年来，各地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化“三医”联动改革，因地制宜学习借鉴三明医改经验，大力推进药品带量采购、医疗服务价格、人事薪酬、医保支付等综合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三明医改的典型示范效应持续显现。要适应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新期待，把推广三明经验作为深化医改的重要抓手，推动医改继续向新的领域拓展，不断巩固扩大改革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孙春兰强调，各地要完善领导推进机制，创造性地把三明医改经验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按照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的目标，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扩大区域医疗中心布局，加强临床专科建设和医学人才培养，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发展“互联网+医疗”，多措并举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扩大国家和地方药品带量采购品种范围，同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医保基金的统筹和管理，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按病种分值付费等精细付费方式，让群众看好病、少花钱。加大公立医院投入，推进薪酬制度改革，确保公立医院公益性。

调研期间，孙春兰到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了解“三医”联动改革、县域医共体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新冠病毒疫苗和诊断试剂研发等情况。



她希望福建省发扬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继续为全国医改作出示范和表率。（据新华社）

[Top](#)

### 【胡春华：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7月8日在京参观“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农业农村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刻感悟党百年来的重农惠农强农光辉历程，增强矢志为农的使命担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胡春华指出，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一条重要主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农村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要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宝贵经验传承好、弘扬好，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党的“三农”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的意识 and 能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推动“三农”领域各项事业发展上。展览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之一，用大量史料和文物再现了党成立100年来“三农”领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和事件。（据新华社）

[Top](#)

### 【郭声琨：强化督导成果运用 不断把教育整顿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7月8日主持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督导工作汇报会议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总结督导工作经验，强化督导成果运用，不断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引向深入，取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实际成效。

在听取中央第一至十六督导组组长关于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督导情况汇报后，郭声琨指出，各督导组把握政治定位，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了督导工作任务。要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健全市县政法单位领导干部交流轮岗机制、正风肃纪长效机制、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政法干警能力素质提升机制等制度机制，把督导成果转化成为推进市县政法队伍建设的实效。郭声琨要求，要认真开展第一批教育整顿“回头看”，谋划做好第二批教育整顿督导工作。要把握省级政法机关职责定位和队伍建设特点，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问题线索和顽瘴痼疾查纠整改、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服务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等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精准有效开展督导，推动教育整顿取得更大成果。（据新华社）

[Top](#)



##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 【当前金融体系已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谈及新发展格局，金融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在 40 年前刚刚开始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它既作为中央银行，也作为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占全国金融资产比重为 93%。当时我们搞计划经济，对金融中介的需求比较少，但从 1978 年至今，我们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庞大的金融体系。

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规模比较大，无论是从银行还是从资本市场市值来看，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比较靠前，其中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第二个特征是管制比较多，我曾经做过 1980-2018 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2018 年的金融抑制指数为 0.6，这说明我国过去四十年来确实是在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 0.6 这个数据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和其他所有国家相比，我国现在对金融体系干预程度相对较高。第三个特征是监管比较弱，我国有比较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是在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处置上还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简而言之，当前金融体系的三个主要特征为规模大、监管弱、管制多。

这样的体系虽然不够理想，但却在过去 40 年来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前 30 年中国年均 GDP 增长接近 10%，前 40 年年均 GDP 增长也超过 9%。所以在支持增长方面似乎没有遇到很大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增长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成本特别低，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产品能生产出来，就能卖的出去，对风控要求不是特别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它存在着较多的政府干预，但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另外，金融体系也保持着稳定。过去 40 年来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我国支持金融稳定主要通过两个手段：第一是政府兜底，第二是持续高增长。政府兜底的好处是，即便出现了问题，投资者和存款人也不会再在短期内丧失信心。持续高增长的好处就是看到了问题采取措施，把流量控制住，存量可以慢慢消化，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最好的例子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银行平均不良率超过了 30%，一些国外专家把我们当时的银行称为技术性破产，实际上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已经是



资不抵债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生挤兑，因为大家相信只要政府在，银行不会倒，所以我们后来有时间重组、改革银行体系、处置不良资产。当时碰到较多问题的大型银行，其资产负债表现在已经比较稳健，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简而言之，政府兜底和持续高增长是我们过去支持金融稳定的有效手段。

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套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最近围绕金融改革经常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强，具体来说就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另一个是普通老百姓投资难问题。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从过去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变成现在创新驱动型的增长。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 GDP 为 200 美元，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已经超过 1 万美元。成本的提高对竞争力和产品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提升生产力，提升产品质量，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成本提高了必须要靠创新的支持，未来我国对创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过去这套金融体系支持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没有问题，下一步再持续用这套金融体系来支持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地减弱。从边际资本产出率来看，2007 年这个指数是 3.5，也就是说每生产一个单位的 GDP 需要 3.5 个单位的资本投入，2019 年这个指数已经上升至 7，也就是说资本投入要求已经翻番，反过来也可以说金融效率其实是在不断地下降。

另外一个问题是金融稳定的问题。过去金融比较稳定，现在感觉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断上升，回顾过去五六年发生的一些事情：2015 年股市回调、外汇市场动荡，2016 年高负债率、杠杆率受到全世界关注，2017 年国内理财产品、影子银行引发担忧，2018 年地方债问题被重点关注，2019 年出现一批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P2P 平台清零，我个人对今年下半年区域性金融风险存在担忧。

总体来看，风险似乎在不断浮现。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是两个支撑金融稳定的要素在弱化。当金融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不可能持续兜底；同时，我国虽然还在保持比较稳健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下一步对监管的要求很高，监管需要及时识别风险、防范风险的积累，尤其是防止发生严重的后果。

### ■从改革、开放、创新入手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基于当前情况，我国提出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改造，使其能够适应支持新发展格局任务的要求。具体的工作内容有很多，下面我将会从改革、开放和创新三个方面简单概括金融体系方面的任务。

首先，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当前金融抑制指数为 0.6，表明政府干预的程度在全世界而言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要进一步降低政府对金融体系运行的一些干预，过去这些干预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将来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

具体而言，比如市场化的风险定价问题。政府监管部门每年都要求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增加贷款，因为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高，所以增加对它们的金融支持是必要的。同时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地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我认为从长期来说是有些问题的。货币银行学里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风险和资金成本要匹配，如果企业借款人的风险比较高，它的利率就应该高一些，如果其风险比较高，我们要求给它发放贷款，同时还要求降低对它的贷款利率，未来长期持续是有困难的。



当然也存在一些市场化的方法来降低融资成本，比如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加强金融部门的竞争、改善风控、财政贴息等，唯一不能长期依赖的就是行政要求银行不断压低贷款利率。在资金配置上也是一样，国企和民企之间怎样真正实现公平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民营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微企业，将来的增长可能很难持续。

在改革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改善监管框架。我国已经具备很完整的监管框架，但在一些领域还没有落到实处。比如前段时间一些中小银行出现风险，这反映出我们的规则出了问题。经济学里有个说法是，好的规则让坏人做好事，坏的规则让好人做坏事。如果规则本身不是特别健全，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普遍。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P2P，当前 P2P 已经清零，但是从 2007 年 P2P 上线到 2016 年第一个暂行管理办法出台，P2P 有 9 年的时间在野蛮生长，野蛮生长期期间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教训时，必须研究怎样更好地监管和防范风险。将来要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肯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兜底和持续高增长，监管者必须发挥很大的作用。

其次，金融开放领域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个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另一个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过去几年，我们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加快，未来还会继续往前走。“十四五”期间，值得期待的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加快，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已经确定，但速度到底会有多快，在步骤上怎样平衡开放和效率稳定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多功课可以做。但开放是至关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是创新。过去我们很多业务做不了，但是现在的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金融创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其实是粗放式的增长，只要学习别人的产品和技术，就可以开展业务。但现在对于学习的要求有所提高，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有提高，过去我们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也没什么问题，但确实是资本市场更擅长、更有利于支持创新，所以我们需要在金融结构上创新，发展更多直接融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同时在风控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具体要做的创新工作。中小微企业现在在中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一直要求改善其服务，但对很多银行来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遇到的困难有两个，第一个是获客难，第二个是风控难。怎么找到中小微企业，怎么对它们进行信用风险评估，这需要创新。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创新，比如数字金融领域，利用大科技平台获客，积累数据，然后对其做出信用风险评估，确实走出了一条好的路子。

总体上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一套非常独特的金融体系，这套体系在过去 40 年（起码前 30 年）支持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是非常有效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这套体系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和对金融稳定的支持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金融体系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继续往前走，构建一个现代金融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支持新发展格局。

我分享一点对陕西金融改革、开放的看法。在“十三五”期间，陕西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陕西过去五年金融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 12.2%，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原来的 6% 多一点到现在超过 8%，说明陕西金融业也在持续的发展。根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排名，西安在全国金融中心排名是第 11 位，在西部地区排第 3 位，是一个中流水平的金融中心。另外，西安的金融结构还不太平衡。西安的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为 85%，超过了全国的比重，



总体来看西安的融资对银行依赖度很高。

陕西金融发展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我的建议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实力。当前还是存在一些空白地带，一般说空白地带，很多人认为是上市公司不够多，当然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是更好的，但我更多看到的是在征信方面的空白。现在全国都在发展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但在西安没有看到。并不是说每个城市都要搞成小而全，而是说在这些领域里可能有一些业务将来需要改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广东、浙江、江苏、山东都建立了金融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把已有的数据全部打通联系到一起，包括税收、公安、社保、房地产、水电费的信息全部汇集到一个平台，中小微企业可以到平台上申请贷款，同时平台给银行提供授权，银行可以到这些系统查询企业的数据，再结合银行自己的信息做信用风险评估。这个办法好就好在它不需要再去构建一套所谓的大数据或者大平台，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数据，如果能很好的整合起来，可以大大开放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进入的门槛，这是值得借鉴的一个做法。

第二，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型增长，陕西西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西安应该是一个科技研发中心，西安的科技力量是很强的，但我也听到有评论说西安的初创研发支持效果比较好，但是落地的产业比较少。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需要产业基础，还是产业工人，还是需要适当的金融支持能力？问题肯定是多方面的，起码在金融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和调研。

包括陕西在内，过去金融主要以银行为主，现在需要以创新驱动产业的落地，把金融服务做的更好。除了看直接融资，银行本身也可以做很多业务模式转型。过去简单的看法是，国家科技水平提高要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但客观上讲，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同样推动科技走到了经济技术的前沿，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英国和美国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德国和日本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这些领域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我们要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但其实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能更好的支持创新，能为支持产业链的落地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及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在过去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出现的很多独角兽企业，但基本上都是在消费互联网领域，那么下一步产业互联网值得密切关注。将来经济走向高质量、高水平增长，产业互联网将发挥很大作用，还有5G技术、新基建也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此外，金融领域下的数字供应链金融、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也能更好的直接嵌入到供应链和产业链中，风控可以更加有效，融资规模可以大幅提升，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

第三，西安的金融中心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关键是发挥其差异性的比较优势。西安要打造丝绸之路区域性金融中心，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十四五”期间政策推进的方向之一，西安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西安已经在跨境业务，包括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等方面进行了试点，可以借助丝绸之路中心的地位来尝试或扩大跨境金融交易。另外，欧洲班列对西安的影响非常重要。欧洲班列开通后，各种货物流、信息流，再搭上金融流，能够使得西安金融服务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有望成为金融开放战略前线城市。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者：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T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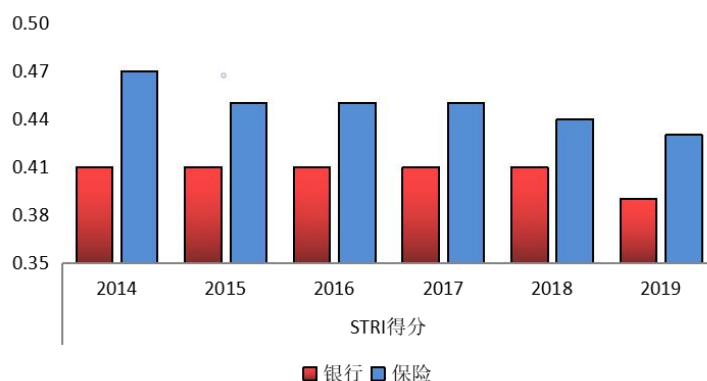
## 【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障碍与政策建议】

### 一、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展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依托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及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 CEPA）等开放模式加快制度创新探索。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准入限制措施大幅减少；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给予金融专业人士从业、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外汇和人民币跨境业务开展等更大力度支持；CEPA 框架下签署的《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也推出金融业七方面的开放措施。

2018 年以来，国务院金融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先后出台 44 条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措施，包括放宽外资股比限制、降低开业条件、允许设立分支机构、放宽营业范围和业务类型等，实质性降低了金融业外资准入门槛和经营限制。总体来看，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 OECD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下简称 STRI 指数，该指数取值介于 0—1，数值越小表示开放度越高。）的评价结果，2019 年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 STRI 指数评分比 2014 年分别下降 0.02 和 0.04，降幅分别为 4.9% 和 8.5%（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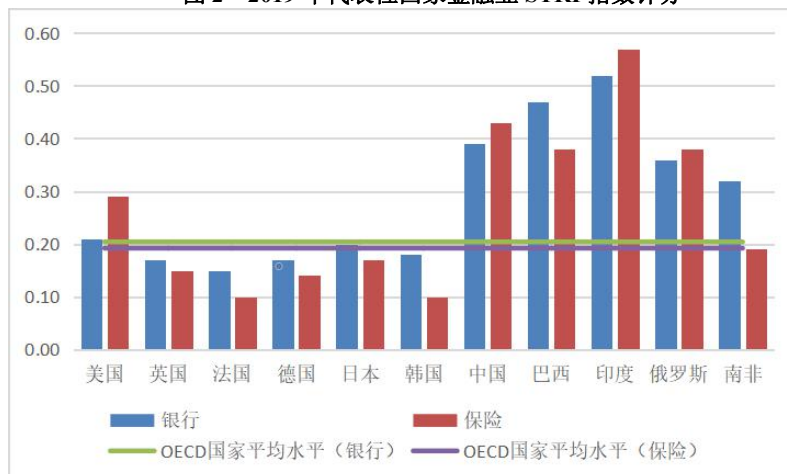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9 年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 STRI 指数评分的变化



### 二、当前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一）总体开放水平依然不高

图 2 2019 年代表性国家金融业 STRI 指数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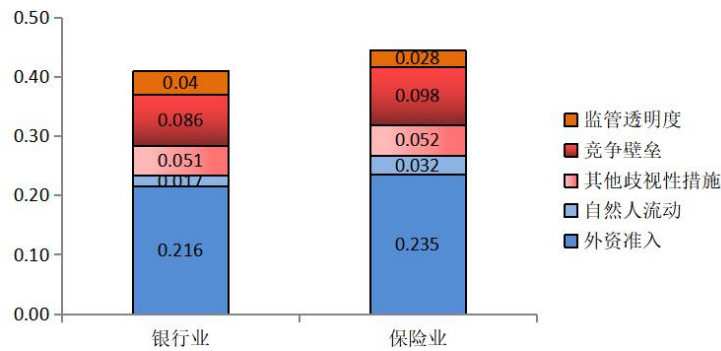


中国金融业开放水平总体不高，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不匹配。2019 年，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 STRI 指数评分分别为 0.390 和 0.430（见图 2），比 OECD 平均水平分别高 0.186 和 0.238，开放水平在 46 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 42 和 43 位。

（二）外资准入和竞争壁垒方面的限制最为突出

从 STRI 指数反映的情况看，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的主要限制集中在外资准入和竞争壁垒方面，自然人流动、监管透明度和其他歧视性措施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见图 3）。

图 3 2019 年中国银行和保险业 STRI 分项指数评分情况



中国金融业外资准入门槛显著高于 OECD 国家。2019 年，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 STRI 指数中外资准入限制分项指数评分分别为 0.220 和 0.230，比 OECD 平均水平高 0.136 和 0.142，在 46 个样本国家中排名第 42 和 43 位（见图 4）。竞争壁垒较高是影响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另一主要障碍。2019 年，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 STRI 指数中竞争壁垒分项指数评分分别为 0.090 和 0.100，比 OECD 平均水平高 0.054 和 0.083，在 46 个样本国家中排名最后，与美国（银行业无限制）和英国、德国（保险业无限制）差距较大（见图 5）。

图 4 2019 年代表性国家金融业 STRI 指数中外资准入限制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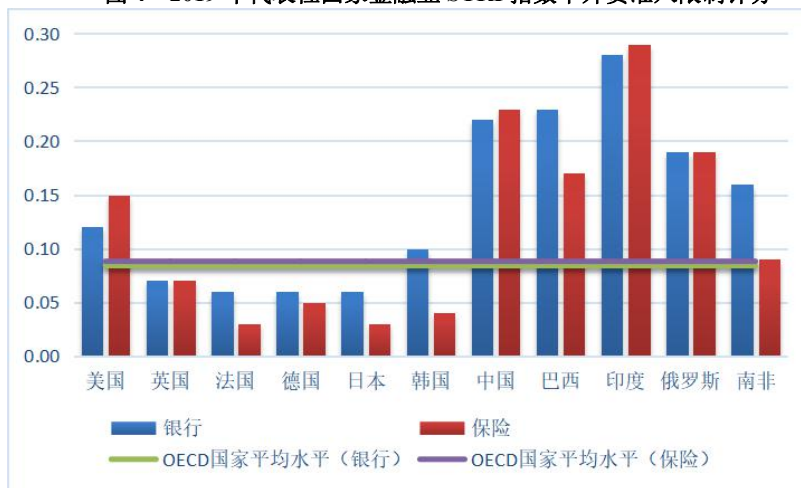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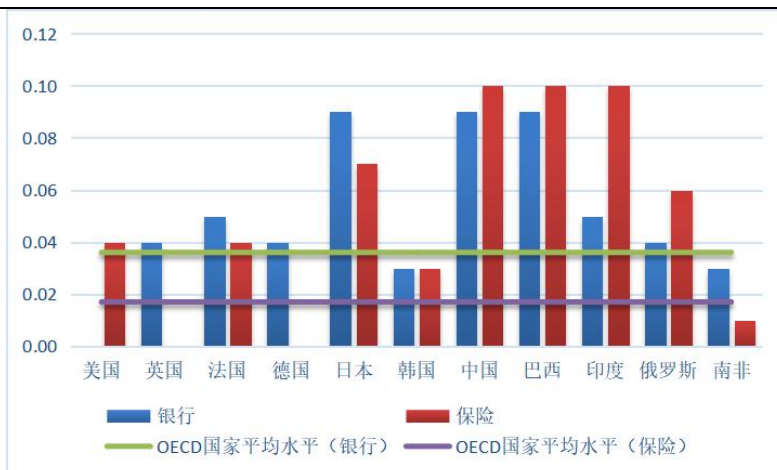


图 5 2019 年代表性国家金融业 STRI 指数中竞争壁垒评分



### (三) 现有开放举措与国际制度标准还存在差距

一方面，很多开放措施未能有效转化为国际通行的制度和标准，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不及时，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业开放水平的直观认识存在一定滞后。例如，部分金融产品创新已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且备案产品范围在逐步扩大，但是该项改革内容未能在现行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体现，导致 STRI 指数对中国该项评价仍为“限制”。又如，新实施的《外商投资法》严格限制政府采购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但《政府采购法》中相关表述未及时修订，导致外资误解和困惑，因此中国政府采购仍被认为限制金融服务贸易。

另一方面，原则性、鼓励性的政策依然较多，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待加强。这主要反映在各类开放平台的金融业开放上，大部分开放举措仍在国家政策法规体系范围内推动，一些举措仍停留在指导意见层面，对改革需求最迫切、最关键领域的创新突破不足。

### (四) 部分开放举措对外宣传解读和国际交流还不充分

例如，2019 年修订后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允许外资银行承销金融债、政府债等业务，但 2019 年 STRI 指数中“部分银行服务为国内供应商保留”评价依据内容未及时更新。另外，随着《外商投资法》实施，外资许可证分配中的经济需求测试、外资审查中考虑经济效益的限制将取消，外资企业获得许可证的标准也逐步迈向内外资统一，但这些改革措施和内容尚未体现在 STRI 指数评价之中，开放成效还未被国际充分认知。在国际标准方面，国家会计准则已与国际会计准则（IFRS）进行了实质性融合，也正在加快推进形式融合，但 STRI 指数依然显示中国会计规则“偏离国际标准”。

## 三、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的主要制度障碍

### (一) 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和拓展经营范围存在限制

一是设立分支机构门槛较高。中国规定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时，拨给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金总额的 60%。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银行体系，大多对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也进行限制，但 OECD 国家一般对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不设限制（美国除外）。另外，中国对外资寿险、产险和再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均设有最低资本金要求，OECD 国家通常无此要求或仅对寿险公司有要求。

二是经营范围存在限制。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申请业务许可证的标准更为严格，而 OECD 国家对内外资要求基本一致（美国、瑞士除外）。



## （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平竞争和干预市场

一是产业政策影响银行业公平竞争。中国银行业存在定向贷款计划，《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从国际上看，OECD 国家不存在明示的产业政策内容。随着一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向普惠性和功能性转型，对竞争政策的重视程度加强，相对刚性的定向贷款计划可以向更加柔性、灵活的方式转变。

二是金融机构新产品和服务存在比较广泛和严格的审批。银行和保险公司创新的产品、服务、费率和费用，需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才能发行。从国际上看，美国、英国、法国等金融市场发达、金融创新活跃的国家更多采取的是备案制，基本不对银行业务创新进行审批，部分审批也只限于寿险产品。

三是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国家政府通过控制大型银行间接影响金融市场，中国政府也控制市场份额较大的银行，这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必然要求。但在保险业，多数国家政府对大型险企的控制较弱，而中国政府对寿险、非寿险和再保险市场均控制市场份额较大的险企，国际上仅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少数国家与中国情况类似。

## （三）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较为严格

一是为维护汇率稳定和防范风险，中国对个人资金跨境转账进行了严格限制，进而影响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开展业务。从国际经验看，OECD 国家中仅韩国和冰岛两国、发展中国家中仅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三国设限。

二是中国金融业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在 46 个样本国家中最为严格。中国一直遵循 WTO 关于金融信息数据保护和跨境流动的规定，各自贸试验区也坚持遵守所签订的关于金融信息数据保护及跨境流动的相关协定。但是，中国金融信息数据保护及跨境流动仅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具体条款存在差距。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唯一在法律层面明确禁止数据跨境传输的国家，也是唯一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五项措施评分全部显示为“限制”的国家。

## （四）对外资存在一些其他限制性规定

一是禁止外资银行通过发行国内证券进行融资。从国际上看，OECD 国家均无限制，发展中国家中也仅印度、南非设限。

二是不允许外资保险公司以外币承保。现行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要求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经营保险业务应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OECD 国家通常允许接受外币账户作为保单结算账户，仅冰岛、哥伦比亚以及俄罗斯等少数国家设限。

三是限制外资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出业务比例。中国规定临时再保险合同转让风险不得高于承保风险的 20%；除特殊财产险种外，分配给再保险人的每个风险单元比例不得超过直接保险合同溢价的 80%或分担的保险责任限额。OECD 国家通常不限制外资保险公司分出比例，发展中国家中仅印度、泰国设限。从中国实践看，此规定也未在实际业务中发挥指导作用。

## （五）营商环境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2019 年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办企业时完成所有法定程序需要的时间超过 9 个工作日，高于 24 个 OECD 国家以及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破产清算成本较高，外资银行在中国解决破产所需花费为其资产的 22%，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 四、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加快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外商投资法》不衔接的规定，研究引入“竞争中立”条款。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优化产业政策中关于定向贷款计划的表述方式。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统一外资企业获得许可证的标准。深化政府招投标和采购制度改革，清除各类显性与隐性壁垒。取消对再保险分保比例的不合理或已经不实际执行的限制，探索和研究外币承保。

第二，提高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探索银行新产品、服务、费用等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快推动车险、一年期以上信用险、保证保险等产品由审批改为备案，扩大备案管理适用范围。稳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市场投融资限制，进一步完善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全面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第三，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强化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等信息共享，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金融数据领域开放，保证金融机构合理的信息需求。加快完善金融数据分类、确权、交易、安全等方面规则和要求，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制定。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在自贸港、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加快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探索与数据保护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试行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互认。

第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缩短企业开办时限，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保险机构退出机制，稳步降低商业银行破产成本。

第五，加强国际制度规则衔接。对标国际制度规则，将国内改革措施尽快落实到法律法规层面。加快全面清理、修改废止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 IFRS 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衔接工作，深入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标准趋同。

第六，加强对金融业开放政策的对外宣传解读。深入理解 OECD 国家在推动服务业开放和规制改革方面的实践，密切与 OECD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全面客观评价中国金融业开放进展。建立更加深入的国际交流机制，推动国际社会更及时、客观了解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发展的动态。

此外，还要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统筹推进金融业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提升金融机构治理能力和竞争力，并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开放中可能的金融风险。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王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Top](#)



##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 【湖南省副省长朱忠明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 湖南省副省长朱忠明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财政部官方网站“职能机构”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朱忠明已任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朱忠明，1972年4月生，浙江海宁人，199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8月参加工作，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与审计系审计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曾长期在浙江省工作，历任浙江省审计厅厅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等职，2020年调任湖南省副省长。（据财政部官网）

#### 黄文辉当选厦门市市长

7月9日，厦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补选黄文辉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文辉，男，汉族，1964年6月生，福建仙游人，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3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2021年1月起任中共厦门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市机关效能督查办主任，市委改革办（财经办）主任，市委国安办主任；2021年6月起任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常务副市长、代理市长。2021年7月起任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据厦门日报）

#### 孔昌生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据《河南日报》客户端消息，7月9日，洛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孔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此信息显示孔昌生已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孔昌生，1963年出生，曾任人社部副部长等职，2017年调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据《河南日报》）

#### 江凌兼任洛阳市委书记 李亚不再兼任

据《河南日报》客户端消息，7月9日，洛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决定：江凌同志任洛阳市委书记、常委、书记，李亚同志不再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江凌，1964年9月生，曾长期在广东省工作，历任清远市市长，韶关市委书记，广东



省委常委、秘书长等职，2018年调河南省，后出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亚，1963年9月生，2016年任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据《河南日报》）

[Top](#)

##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 【周维富：加快建设现代区域发展体系】

区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空间载体，是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布局 and 区域发展体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提出了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又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构建纵横联动、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新格局，成效明显。但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区域分化现象较为明显，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解决上述问题，亟待从多个方面入手，加快建设现代区域发展体系。

#### ■健全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健全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统筹机制。建立现代区域发展体系，需加强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的融合发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统筹发展。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进的契机，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之间的融合发展，统筹解决区域发展重大问题。要统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相结合，鼓励发达地区通过开发区、园区、“飞地”等平台跨区域运营，扶持和帮助欠发达地区建立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的园区载体，统筹支持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发展平台，推动形成跨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打造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螺旋上升的良好发展格局。

其次，要健全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应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破除



区域的行政性壁垒，促进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要围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编制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以推动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和区域间要素资源的交易成本和配置成本，进而实现区域生产率的提高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要健全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应积极发展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有序发展区域性行业协会商会，鼓励社会力量组建跨地区跨行业产业、技术、创新、人才等合作平台，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区域合作新机制，推动区域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对外开放、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提升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合作层次和水平，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等重点流域经济带上下游间合作发展，鼓励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粤桂、湘赣、川渝等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

最后，要健全完善区域间利益补偿机制。根据当前国土空间划分，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意味着不同的发展权。比如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主要承担优质农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的功能。不同的发展权导致区域之间实际收益有较大差异。同时，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十分健全，资源开发地区和资源消费地区也有较大的收益差异，健全完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是调整区域利益失衡、促进产业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原则，建立健全“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的市场化、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流域上下游之间通过资金补偿、项目补偿、对口支援、基本公共服务共有共享、碳排放交易等多种方式建立公平合理的横向补偿机制，更好地促进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共同发展。

### ■构建统一高效的区域发展管理机制

设立权威、综合的区域发展专门管理机构，加强区域立法，是建立现代区域发展体系的重要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区域发展管理体系建设还比较薄弱，管理机构职能交叉重叠，资金多头分散，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渠道；区域经济发展以行政区为界线，缺乏区域间的互动机制。为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构建区域发展管理机构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定位，完善管理机构设置，加强立法工作，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长期稳定实施，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建议根据客观实际发展需要，对目前各类区域经济管理机构进行科学整合，建立权威、统一的区域发展管理机构，统筹研究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进程。要研究论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规制度，明确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战略重点和方向，健全区域政策制定、实施、监督、评价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研究机构、企业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

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建设中，市场发挥着主导作用。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打破影响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地区壁垒，建设全国统一、自由开放、



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尤其要加快废除妨碍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营造规则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信用、金融、信息、产品质量、公共服务、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协同；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和区域协调机制；支持建设跨地区、跨行业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鼓励共建科技研发和转化基地；探索建立企业需求联合发布机制和财政支持科技成果共享机制；清理城市间、区域内因技术标准不统一形成的各种障碍。

### ■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卫生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国民都能公平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现代区域发展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还比较突出，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深入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对于财力不足、财政收支缺口大的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扩大转移支付规模，加快完善针对财政困难地区支持机制，不断提升财政困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尤其要增加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逐步缩小其与发达地区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在符合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将公共事业机构、设施和项目布局在欠发达地区，以便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建设方便快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共有共享，加快建立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跨区域流转衔接制度，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流动。

（来源：《社科院专刊》，作者：周维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Top](#)

### 【卢锋：透视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

与十余年前金融危机比较，在美国政府应对疫情衰退的政策选择中，财政工具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美国去年以来接二连三推出财政救助刺激计划，财政资源耗用规模已数倍于上次金融危机应对；即便在经济复苏前景已大体明朗背景下，拜登政府仍决定推动多项超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显示未来强化相机抉择财政调控方法可能会趋于常态化。美国宏观调控更加倚重财政工具，不仅与多方面现实经济要求和压力倒逼作用有关，也是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学界重新研究财政功能定位与财政决策方针调整的产物。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及相关政策动向，不仅将制约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也会产生复杂的外溢作用，有必要观察研判并应对。

#### ■美国新近财政调控政策特点

新冠疫情冲击使美国经济遭遇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幅收缩，倒逼美国政府实施规模空前的宏观救助刺激政策加以应对。财政干预手段运用与十余年前应对金融危机时比较呈现出两重特点。

一是财政救助刺激规模数倍扩张。2020年特朗普政府共出台五次财政刺激措施，总金额3.78万亿美元。今年初拜登入主白宫后在3月底通过1.85万亿美元



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目前正在推进重点包括大规模基建的 2.35 万亿投资计划，4 月 28 日又公布 1.8 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从绝对规模看，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动用的财政资源总额达到 1.87 万亿美元，占 2008 年美国 GDP 总量 12.7%；如扣除两房救助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狭义财政刺激规模约为 1 万亿美元，占 2008 年美国 GDP 规模近 7%。过去一年多特朗普与拜登政府已实施财政救助刺激金额为 5.65 万亿美元，约占 2020 年美国 GDP 总量 27%。剔除 CARES 法案中某些贷款和担保等企业救助内容，狭义财政纾困和刺激政策规模大概是应对金融危机时狭义财政刺激绝对规模约 5 倍和相对规模 3 倍多。

二是显示大规模财政干预常态化冲动。上次应对金融危机时，随着美国经济在 2009 年下半年开始走出危机“急救室”，奥巴马政府在《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后没有谋求实施新的财政刺激计划，而是从 2010 年初开始着手减少赤字率控制债务扩张风险，为此签署了《2010 年法定量入为出法案》和《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新近财政干预谋划思路大相径庭：2021 年初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已比较明朗，然而拜登政府上任后仍然坚持采用只需获得简单多数即可快速通过的“预算协调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强行通过 1.85 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法案”。目前拜登政府推动的基建计划和家庭计划宣称投资美国未来一代，其中基建计划拟定执行期限八年，家庭计划绝大部分支出项目设想在未来 10 年分配。新一波财政政策把危机应对与长期振兴意图捆绑在一起设计，显示拜登政府不仅要用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手段应对危机，而且要借此实质性提振美国长期潜在增速。

### ■ 聚焦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

最近美国财政政策画风大变，既有现实原因也有认识根源。现实因素首先是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危机派生定向性救助需要，对财政刺激范围、强度和方式提出特殊要求。其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增速持续下滑，使得美国精英和决策层对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所预示的日本化前景倍感焦虑，希望财政刺激工具超常运用不仅能拯救经济危机，而且能推动一个内生动能不足的经济重回高速增长轨道。最后美国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收窄与国债收益率处于历史低位，也对财政刺激政策超常发力产生倒逼作用与提供支持条件。

特定政策作为决策主体选择结果必然受到理论与认识支配，美国最近财政刺激干预大幅度加码，也与近年美国学界重新研究传统财政政策方针并推动财政决策思维转变动向有关。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与凯恩斯理论创新，推动美欧西方国家经济体制与宏观管理政策架构发生革命性变化，为积极利用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波动特别是应对经济衰退提供了理论与体制条件。二战后美国财政政策取向在不同时期经历变化调整，然而总体延续了一些相对稳定因素，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财政决策思维表现出几点传统共识性方针。

一是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两类财政政策工具共同发挥调节宏观经济功能，然而在应对金融危机实施 ARRA 等刺激法案前，更加重视发挥自动稳定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二是相机抉择财政干预政策虽然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种调节方式滞后期较长，并可能对民间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因而比较倾向采用货币政策调节工具。三是“财政周期平衡”理念具有较大影响。如 1985 年《平衡预算和紧急赤字控制法》、1990 年《预算执行法》和 1997 年《平衡预算法》，显示不同时期美国决策系统为保持财政长期平衡所做的努力。

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美国内外经济环境演变的结构性特征，对美国有关财政宏观政策功能定位的传统认识提出新挑战。在失业率回落缓慢与增长动力持续



不足形势下，美国学界关注研究深度衰退后劳动力市场“疤痕效应”以及导致宏观经济复苏疲弱的“遗滞效应”，激活有关美国经济“长期停滞”以及国债收益率回落到历史低位相关现象的热烈讨论。如何利用美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特有优势，实施超常规宏观政策人为造成所谓“高压经济”环境，通过提升宏观景气度摆脱上述困境，成为近年美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议题之一。应运而生的财政决策新思维，在疫情危机环境下获得付诸实施与大干一场的现实场景。

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的核心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动态演变呈现出一系列结构性特点，使得超越传统财政政策强化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与紧迫性。其主要政策结论是采用超常规财政刺激手段支持美国尽快摆脱疫情，并通过对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大规模投资，实现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与重振美国经济的战略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分析观点。

一是基于对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实施财政政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传统偏重稳健目标的财政政策方针提出质疑，并支持强化财政宏观干预政策取向。大量研究显示，当时财政政策干预特别是 ARRA 法案显著减缓了经济衰退程度与失业率升幅，对控制危机恶化影响发挥了显著积极作用。同时认为当时实施的财政纾困刺激政策退出过早，2010 年开始以控制赤字为导向的财政整顿政策派生紧缩效果，客观上导致失业率高企局面延续过长，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疤痕效应”与宏观经济层面的“遗滞效应”。由此对传统偏重稳健目标的财政政策方针提出质疑，并支持更加激进的财政干预主义立场。

二是在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中淡化负债率与强调偿债率指标，为激进财政负债干预政策提供学理与经验依据。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取决于债务总量、利率水平、财政收入、经济体量等一系列因素，具体评估往往较多借助负债率、偿债率等结构性指标。由于给定收益率与财政收入占比等因素，特定负债率水平决定偿债率，因而传统上比较重视负债率指标。近年相关研究质疑负债率在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中意义，认为债务额存量指标与 GDP 流量比较存在逻辑问题；同时强调偿债率重要性，认为收益率回落背景下偿债率会在负债率上升时趋于下降；由此认为无需担忧负债率，不应因此妨碍必要的财政刺激干预。

三是更为激进学者通过历史研究与理论建构，依托主权信用是现代国家财政和货币基础命题立论，分析论证扩大财政刺激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这类分析不仅从根本上质疑传统财政保守主义观点，也显著偏离超越了传统凯恩斯学派思想。例如有的学者直接从上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功能性财政（functionally finance）”学说中寻求强化财政干预的理论依据。又如主张央行可直接购买国债即通过“赤字货币化”为财政扩张融资的“现代货币理论”，也走出早先被看作异端经济学思想的边缘位置，在近年开始引发广泛关注讨论。

四是就美国目前经济形势提出对策，认为美国经济面临长期停滞困境与超低收益率条件，有必要持续实施超常力度财政政策促成经济稳健增长。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经验显示财政刺激政策发挥了显著积极作用，并有经验研究显示越是负债率较高国家财政刺激政策效果更好，因而认为在美国目前形势下财政刺激措施力度不足反而代价过高。在刺激政策未来效果面临过度与不足不确定风险置换约束时，应采用不对称评估方式对刺激不足情形赋予更大风险权重，并按照“宁强勿弱”或“宁过勿缺”方针选择刺激规模和节奏。这一点或可解释拜登政府要员回应财政刺激适度性争论时强硬表态要“大干一场（Act big! Go big!）”的思维逻辑。

### ■美国财政刺激新政影响前瞻



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对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分析观点，刺激措施对提升美国短期经济增速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也会有一定作用。然而依据经济学一般规律并结合美国现实国情条件，无论是财政或货币刺激都无法难以提升美国长期潜在经济产出，也无法仅凭刺激手段解决美国基础设施短板瓶颈等结构性问题。

财政刺激属于宏观政策，基本作用是提升总需求，在应对以总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经济衰退或危机时确有效果。然而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与基础设施短板存在，更为实质性原因是受到供给面条件限制，比如受到制造业外部竞争力不足或建筑业等不可贸易部门效率低下等导致国内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制约。财政刺激无法解决供给侧约束，人为加码刺激反而可能造成以下负面影响。

一是超级宽松货币加上超限财政刺激造成流动性过剩，并通过需求短期激增从实体经济和流动性两方面增加通胀压力风险。美国今年第1季度GDP平减指数增长3.8%，消费支出价格（PCE）指数增长3.5%，分别比去年4季度1.7%和1.5%超出一倍有余。5月美国CPI同比增速进一步跳升到5%，同月核心CPI同比增长也上升到3.8%，都显著高于此前市场预期水平。可见美国经济已面临显著通胀压力。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与美国超级宽松宏观政策也有关系。

二是推高资产价格和金融风险。当代全球化环境下，CPI等流量物价上升受到新兴经济体生产率追赶带来制造品价格长期相对较低因素制约，使得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更容易在过度流动性环境下面临价格飙升和泡沫化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世纪初年美国两次经济衰退都由资产泡沫破灭引起。目前美国几种主要股指持续大幅上扬并屡创新高，房地产价格过去8年持续增长并在去年进一步高位提升，提示资产价格压力持续集聚并提升金融风险。

三是刺激政策将美国经济增速推高到超出开放环境下国际竞争力支持的潜在产出水平，由此派生美国进口超常增长与外部逆差失衡加剧，并为后续美国挑起对外经贸争端设置背景。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从去年4季度4.3%提升到6.4%，3月份失业率已降到6%较为接近长期均值水平，同时货物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长，3月逆差达到750亿美元。按最近数据推测美国今年贸易逆差可能再创历史记录，逆差GDP占比也可能达到最近十年新高。

四是美国官方债务快速攀升的灰犀牛风险。2014年美国国债规模达到17.82万亿美元，总负债率第一次突破100%。2020年债务上升到26.95万亿美元，总负债率飙升到128.7%；其中扣除联邦政府机构相互投资部分，公共持有债务负债率也第一次超过100%，接近1946年118.4%的历史峰值。美国联邦债务基本是美元本币负债，从历史经验看通胀是降低高债务负担的主要途径之一，如二战后十多年通胀因素使得美国1946年负债率峰值降低近一半。美国目前负债率超常飙升，使得包括我国投资主体在内的美元名义资产持有者风险上升。

（来源：网易研究局，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

[Top](#)



##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 【冒险解封 英国为何这么急】

德尔塔变异病毒正在全球蔓延。受此影响，许多国家加强封锁：澳大利亚于6月30日宣布有4个主要城市采取封锁措施，受影响人数约占澳洲总人口80%；6月27日，马来西亚宣布“无限期”延长封锁。与它们不同，英国却另辟蹊径。7月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英格兰地区最后阶段的解封计划，这份计划称如果疫情形势发展符合评估标准，将于7月19日实施最后阶段的解封措施。

#### ■最新解封计划出炉

这份新鲜出炉的解封措施取消了大部分限制，例如取消在商店、地铁等公共场所须戴口罩的规定；除一些特定场所，不再要求保持一米以上社交距离；所有经营场所可恢复营业；不再要求居家办公等。根据英国政府之前的规划，只有当疫苗接种率、疫苗的有效性、患者的住院率以及变种病毒的情况等多项指标符合解封标准，才会实施以上解封措施。英国政府将于7月12日进行最终确认，决定是否按计划实施最后阶段的解封。

此前，英国政府原定于6月21日进入到解封的第四阶段，但被德尔塔变异病毒的蔓延推迟了行动的脚步。政府被迫于6月14日宣布，将解封时间推迟四周再另作决定，并希望能充分利用这段额外的封锁时间，提高疫苗的接种率。这段时间里，英国的疫苗接种率确实得到了提升。尽管感染率明显上升，但英国国内住院和死亡人数并未激增。英国政府认为，在预防重症方面，新冠疫苗确实能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86%的英国成年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63.8%的成年人接种了两针疫苗。而这样可观的疫苗接种比率，或许是英国政府决定解封的信心来源。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5日称，9月前，英国所有成年人都将完成两剂次新冠疫苗接种。

然而，疫苗接种率较高，并不意味着英国肆虐的疫情得到缓解。据英国政府7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逼近3万，达到27334例，累计确诊4930534例；新增死亡9例，累计死亡128231例。根据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哥伦比亚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英国“榜上有名”，可见疫情形势并不乐观。

#### ■反对声不断



面对不甚明朗的疫情形势，在英国政府宣布下一步解封方案之时，英国国内反对声不断。医学专家认为，随着德尔塔变异病毒在英国、欧洲和其他地区蔓延，英国7月就打算放开封锁措施显得过于冒险和激进。BBC评论员尼克·特里格尔表示，目前，在德尔塔变异病毒肆虐之时，只有英格兰地区执意企图解封，而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将制定自己地区的防疫政策。其中，苏格兰将延续口罩令，甚至直到8月9日，当最后一阶段的限制放开之后，也可能会延续这样的要求。一些科学家和政客敦促人们保持谨慎，他们表示，不佩戴口罩和取消社交距离都可能是危险的。政府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心理学家斯蒂芬·雷谢尔说，应对病毒传播应当采取逐步放开的措施，而不是直接取消口罩令。他认为，“在拥挤的地方佩戴口罩”应当成为新规。

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的观点更加直截了当，他表示，政府的决策是“鲁莽的”。他与雷谢尔有着相似的观点：“一个平衡的方法，一个适当的计划，应该是保持关键的保护。其中之一是在封闭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这是常识。”除了对计划中取消口罩令的规则议论纷纷外，医学专家对于解封后可能潜在的风险也表示担忧。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理查德·德特表示，目前新冠疫情仍然猖獗，而此时解封，“有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变异”。更危险的是，新的变异病毒很可能更具传染性，甚至对疫苗无效。德特更是直言，政府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解封方案在“玩火”。

### ■为何着急解封

英格兰地区冒进的解封方案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逐步恢复的经济的刺激。当前，英国经济正逐步重启。6月9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4月经济产出较上月增长2.3%，4月GDP较去年同期封锁时期创纪录地增长了27.6%。如此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让英国官方看到希望，对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英国工业联合会（CBI）6月17日表示，预计到2021年底，英国经济有望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该协会表示，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将增长8.2%。

隆众咨询首席战略官闫建涛表示，当前英国整体的经济增速好于市场预期，如果能尽快放宽限制，经济增速将更加明显。这正是英国政府所希望的。如果能尽快解封、乘胜追击，就能释放因封锁而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全面复苏。同时，根据路透社6月29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情况在自己的预期之内。这也令英国央行更加相信，当前的物价上涨没有过多影响大众。既然经济还没有“过热”，英国政府更加有信心通过解封来为经济进一步“加热”。

为经济“加热”还有利于改善供应链的情况。闫建涛表示，当前由于全球疫情形势的反复，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不断加剧，而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几个月。如果英格兰地区能顺利解封，这将会刺激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加强供应链弹性，促进英国经济进一步复苏。除了维持当前向好的经济形势，更重要的是，解封进程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分行业的命运。CBI表示，希望这一次封锁是最后一段封锁期，如果包括酒店、航空等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在这一阶段重启失败，那将会对他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不利于整体的经济形势。（据北京商报网）

[Top](#)

### 【缩减QE意见不一 美联储在犹豫什么】

虽然两大阵营意见不一，但最新释出的会议纪要表明，对于缩减QE的计划，



美联储依然“稳坐泰山”。“保持耐心”“只是暂时”……在“放水”和通胀的压力高企之下，美联储放的鸽或许还要再飞一会儿。

### ■ 两派分歧

在一年多宽松的货币政策后，美联储何时转向，成为全球投资者不得不关注的内容。当地时间7月7日，美联储公布了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不过，对于缩减QE，美联储依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份纪要显示，鉴于美国通胀和就业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官员对于缩减资产购买计划存在分歧。

一些美联储官员认为，经济复苏的速度快于预期，同时伴随着通胀的大幅上升，美联储应该要采取行动，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的条件会比之前预期的更早达到；但另一些官员认为，仅凭当前经济数据不足以明确研判美国潜在经济增长势头，几个月后才能更好评估就业市场和通胀走势。

除了对缩减计划的开始时间有争议，会议纪要还显示，美联储官员对于如何缩减资产购买计划也存在分歧。数名官员认为，考虑到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相比削减购买美国国债，应更快或更早削减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其他几名官员倾向于同等比例削减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虽然美联储内部出现了两种说法，但会议的主基调仍是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需要“保持耐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表示，总体来说，这份会议纪要没有什么超过市场预期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美联储知道有风险，但现在不是行动的时候。”Oanda高级市场策略师Edward Moya也认为，美联储会议纪要整体偏鸽，明确排除7月宣布缩减QE的可能性。但关于经济数据的辩论正在升温，美联储显然仍处于观望状态。

美联储的“按兵不动”，也让市场信心大增。7月7日，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创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涨104.42点，涨幅0.30%，报34681.79点；纳斯达克指数涨1.42点，涨幅0.01%，报14665.06点；标普500指数涨14.59点，涨幅0.34%，报4358.13点。

### ■ “通胀只是暂时”

整体来看，此次会议纪要的分歧多于共识。不过，有一项取得了主要共识，那就是通胀水平。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CPI环比上涨0.6%，同比增长达5%，创下2008年8月以来最大同比增幅；PPI则同比上升6.6%，为2010年11月有可比数据以来最高水平。

如此大的涨幅下，美联储成员上调了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他们普遍的看法是，尽管今年通胀会飙升至3.4%，但压力会在未来几个月得到缓解。哪怕不乏有人认为价格上行压力会持续到明年，但纪要特别强调了“通胀是暂时的”。

除了美联储，白宫也称美国通胀上升是暂时现象。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塞西莉亚·劳斯6日表示，近期美国通胀上升主要是由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和经济重启后消费需求激增造成，一旦供需趋于平衡，通胀将会回落。

劳斯指出，美国最近3轮通胀（1973-1982年、1989-1991年和2008年）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油价飙升影响，但当前美国物价上涨并非主要由油价驱动，而且美国已成为净石油出口国，油价对美国的影响与过去不同。当然，美联储官员们并不讳言今年通胀上行的幅度有些令人意外。不过，会议纪要透露出他们对通胀未来的路径莫衷一是，这可能也是暂时保持政策耐心的原因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通胀的持续，一个“隐藏风险”已被触发——通胀永久性上涨的风险提高了。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tzius表示，自危机以来，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已上涨6%，而底层工资的强劲增长，正是推动通胀永久性上



涨的风险点之一。不过，与会官员也总体上都同意，一旦通胀失控或出现其他风险，美联储必须采取行动。正是为了应对高通胀风险，如今已经有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 6 国，先于美国一步宣布加息。

### ■何时缩减

短时间内货币政策不会收紧，再加上此前大规模“放水”的财政政策，美国早已水漫金山。就在一周前，美国还通过了一项基建法案，计划投入 7150 亿美元，发展交通、水利等基建计划。

杨水清指出，美联储不收紧货币政策，其实是他们认为经济风险仍然存在，比如就业不够充分、疫情仍未远去等。有与会者表示，美国经济远远没有实现就业目标。虽然最近就业增长强劲，仍比预期的要弱，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在不同的族裔和收入群体以及不同的部门之间仍然是不平衡的。

在疫情方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Delta 病毒株是美国新冠感染的主要毒株，超过了 Alpha 变种。数据显示，在截至 7 月 3 日的两周内，美国感染 Delta 变异毒株的新冠肺炎病例数占新增病例数的 51.7%。

但每个月美联储的会议，总让何时缩减 QE 的猜测纷纷。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 8 月或 9 月宣布缩减资产购买的策略，并在年底前或明年初开始正式启动削减购债规模。美国银行经济学家 Michelle Meyer 表示，自美联储上次会议以来，大多数美联储决策者都对经济表达了更为普遍乐观也相对鹰派的看法。一些决策者暗示，他们认为最近的就业增长和通胀超标意味着朝着美联储就业最大化和稳定物价的目标取得“实质性进一步进展”，这种情况将允许他们开始缩减资产购买，甚至在明年底前就启动加息。

至于退场的过程，杨水清表示可以用上一次货币政策调整的 7 个月时间作为参考。这要追溯到 2013 年，当年的 5 月，美联储会议纪要和时任主席伯南克首次公开讨论退出；9 月，美联储开始列举 QE 退出理由和运用何种方法缩减 QE 规模；到了 12 月，美联储开始明确并实质性削减 QE。（据北京商报）

[Top](#)



##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将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

#### ■新的中华文明

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有限，但中华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中国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传统儒家学说。与之相比，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方面。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这个冲击如此猛烈和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想法，仍是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历史上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清廷上下这才开始觉醒，洋务运动应运而生。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让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师夷长技”不能救中国，制度变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后的变革没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无力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共和政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无阶级差别的新社会。外敌入侵迫使党与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在哲学层面，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层面，采取中庸和渐进的改革策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的转型；在政治层面，延续中国传统的贤能主义，建立干部队伍的选拔体制，选贤任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思想，创造新的中华文明。如同消化佛教冲击一样，中华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标志是：如果不刻意深究，中国人已经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从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2021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中国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的第一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时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 ■第二次文化冲击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远超佛教。佛教的母国印度并不比中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无论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对中华文明都有压倒性优势。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时，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农业文明支撑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层面。当时，西方已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生产力实现了指数级飞跃。面对西方的强势冲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但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均无法承担起在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的任务。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自我定位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一大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联合第三国际，党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一大虽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并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标准和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但并未触及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中国该走向何方。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实践党的一大确立的纲领，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纵向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遏制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今天，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视为理所应当之事，但横向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

以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极其相似的印度为例。两国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1949年成立，印度1947年独立；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时，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印度此时仍是一个穷国，中国虽然更穷，但在其他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比印度高25%，人均期望寿命比印度高12岁，婴儿死亡率比印度低50%。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但这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教育发展策略的不同：中国重视为民众提供基础教育，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



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推动工业化，但中国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 GDP 的比例方面，中国比印度高 23%；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比印度高 4.3%。这些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如何评价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肯定的是，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认识上的错误，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事实上，自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但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与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因此为工业化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更为艰难。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时间去消解古代社会的制度遗留，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但这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的有选择的吸收。当然，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社会改造中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更需要的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 ■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体现在对“阶级斗争”的重新定位上。1981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真总结了党在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1982 年，党的十二大重新界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党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按照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能依靠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今后党的实践。邓小平带领党从社会改造转向经济建设，指导其实践的是中国的务实主义哲学传统。1978 年 5 月开启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



大讨论，在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事后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脱离教条、走向务实的新起点。马克思成长于德国的思辨哲学传统之中，却自觉超越思辨哲学，特别是在撰写《资本论》时，他使用了大量实证方法。但对于中国人而言，他的理论仍然太抽象，特别是他关于终极真理的理论，在中国这片崇尚当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难生根发芽。邓小平的改革实践是从朴素的认知出发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意识到，教条式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中国落后于周边国家，引进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践。邓小平的“猫论”恰逢其时：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农村改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为解决温饱问题发起的，很快就从“包产到组”演变为“包产到户”。这一改革之所以最终能够打消领导人的疑虑，是因为它几乎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受农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也开始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极大提高了地方的积极性，为 1994 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渐进式改革成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特色，这在 1984 年秋开始的城市改革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具体办法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量仍然使用计划价格，计划外的产量使用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定价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这种“一物二价”现象是行不通的，因为会催生黑市和倒卖计划内产品。黑市和“倒爷”的确出现过，但价格双轨制总体上成功了，让中国避免了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市场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生存空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进入 90 年代，以 1994 年汇率并轨为标志，价格双轨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价格改革完成，新一轮改革围绕国有企业展开。与农村改革一样，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来自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率先开始国企改革，原因都是国企连年亏损，地方财政不堪重负。1995 年，中央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革在全国铺开。

上述实践都先于党的理论；官方意识形态总是追认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实践。作为对农村改革的认可，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3 年 10 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响应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已有改革的承认，而且还对后续改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90 年代的改革加快了我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改革成果在 1999 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02 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三个代表”理论写进党章，这一理论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经历 90 年代的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变，“三个代表”理论正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上仅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而是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表达的场所以；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 ■ 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在理论层面，中国化刚刚起步。党的理论要回归中国传统，难度很大，毕竟反传统是



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但是，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刺阶段的起点上，是时候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了。这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优秀的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

### （一）务实主义

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之时，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此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很早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诗经》才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务实主义会消解这种冲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的战争。

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应以服务于人和社会为目的，制度本身不能成为全社会信仰和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为终极目标完全不同。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

### （二）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均衡

现今的一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这与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观点相左。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犹如一袋马铃薯，一个个马铃薯相互独立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社会，西方社会则因为宗教团契形成市民社会。这些先贤的观点比现今流行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因为没有宗教，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佛教曾经短暂地在个别地方打破了这种格局，但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血缘和地缘还是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家族与政府之间，中国社会少有其他社会团体。在基层，主导中国社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的维系必须有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超出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国社会就必须依赖政府维持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强政府正是基层家族个人主义所要求的，中国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以服从权威换取秩序的表象。

这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在王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宗教和习惯法法庭就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们是介于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组织，起到了组织和管理社会以及对抗王权的作用。中国社会缺少这样的中间组织，大型社会动员和组织都需要政府直接操办。由此，在中国建立问责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难。但中国的个人主义+强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崇尚个人努力和成功，这使得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个人价值这样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容易产生企业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会容易听从政



府的调遣，在危急时刻容易形成社会合力，有助于成功化解危机。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应对疫情也比西方更加成功，就是证明。

### （三）贤能主义

中国式个人主义的一个后果是贤能主义。不同于西方单一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人生而不同，但除极其聪慧和极其愚笨之人外，其他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对于儒家来说，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为一个人最终拥有什么样的才能和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抽象平等忽视了努力的作用。儒家只承认关系平等，在社会分配方面，主张回报与努力成正比，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有相通之处。这种人性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在个人层面，它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政治贤能主义，即要求官员具备与其公共职位相匹配的道德和能力水平，职位越高，要求越高。从西汉的察举制度，到唐宋形成的科举制度，再到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政治贤能主义始终贯穿其中。

一个民族的任何优点，也一定是它的缺点。贤能主义也不例外。它最严重的缺点有二：一是缺乏对个体先天差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照，在奖励个人成就时会忽视个体和社会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会群体意识，强化个人主义对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排斥。在国内，强政府可以部分弥补这些弱点；但在海外，这些弱点就造成了华人“只顾自己”“不关心政治”“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形象。

然而，贤能主义可以成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一剂解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本来不是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体制。但是，“一战”之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民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演变为今天的民粹主义。为回应战后民主化和民权运动的冲击，西方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为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依据，为上述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纯粹的民主制都无法获得理性的政治决策。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长期来看，放弃政治层级和贤能主义原则，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无法在其他国家完全复制，但其背后的政治贤能主义却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相较于完善民主，重新引入贤能主义、完善共和体制，才是应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出路。

### （四）德治

以往对中国政治的一个批评是，中国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这个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因此完全否定人治，过于武断。世界上没有完备的法治，因此总是给人治留下空间。问题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么样的人治。中国政治史告诉我们，德治是指导人治的根本原则。对于儒家而言，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仁”。“仁者，爱人。”仁政就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要实现“仁”，统治者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很高的德性，不仅能克己复礼，而且能判断什么是“仁”。与当代西方民主强调对政府官员实施问责不同，中国政治强调政府官员的责任。问责是对官员施加的被动约束，责任是要求官员必须主动为民众服务。前者因此会弱化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后者却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能力。两者都不能走向极端：前者过于极端，就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后者过度强调官员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官员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在现代社会，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要求官员，应该是最佳组合。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党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西风东渐在中国留下来的最显著的成果，是中国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证明。然而，如何定义“中国特色”，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前一节表明，中国文化拥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特质。这些特质应该成为构成“中国特色”的元素。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特质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哲学。当今的世界文明，是轴心时代的延续。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华文明大放异彩，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想资源。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必须从那个时代寻找资源。就政治哲学方面的潜力而言，儒家学说无疑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说。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是最可行的方案。

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一致，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来自对人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来自理论构建。人性是人的普遍特性的集合。但是，这种普遍特性是个人特性的集合，而个人的特性取决于一个人先天的材质、后天的环境和个人努力。现代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个人在生理层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积造成的结果。因此，谈论普遍的人性没有多大意义。每个人最终形成的人性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政治过程非常重要。

政治参与的最小单位是个体，它涉及个人的德性、知识量、判断力和执行力等多方面因素。由于个人成就不同，不是所有人都应参与所有政治过程。政治层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层级需要不同的个人德性和能力。越高的层级涉及的决策越复杂，因此需要更高的德性和能力。为此，官员的选拔不应该全部交给民众决定，而是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完成。作为选拔机构，中央机构本身的官员也必须具有很高的德性和能力，正因此，中央机构也为国家提供大政方针。但是，中央机构的权力必须受到民选的主权机构的约束，它的人事任命和大政方针必须经由主权机构同意方可实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仁，中央机构的决策如果有利于仁的实施，就会不惮于交由主权机构审议；其二，中央机构把决策交由主权机构议决，可以消除民众对中央机构是否诚心实施仁政的猜忌。在这里，主权机构的主权是被动的，它不主动提出立法和人事任命，这与自由主义民主的主权不同。与自由主义民主一致，主权机构之下设立行政机构（政府）。此外，为防止中央机构滥用权力或出现决策失误，还需设立一个谏议机构，专门负责监督中央机构的行为。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各政治主体之间取得平衡，为社会提供秩序并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把社会目标交由多数选民决定，这不一定是社会的最优选择，因为合意的社会目标未必由多数选民所掌握。上述儒家政治架构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但同时也纳入了西方的民主以及权力制衡因素。这样一种共和体制有利于实施合意的社会目标，也可以防止任何权力的独断专行。它与自由主义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样保护基本的个人自由。但是，它拒绝抽象的平等，只接受比例原则下的平等。由此形成的儒家自由主义，既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又比自由主义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因此更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施。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上述儒家政治结构高度重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主权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谏议机构。党在理论层面的中国化，必须从吸收儒家政治哲学开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资本主义的产物，传入中国之后，成为党战胜旧制度及其一切从属势力的武器，也为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态不适合作为党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导，我们要做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此



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向世界展示自己独创的文化。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构建党的新理论，是党在百年华诞之际最重要的任务。一个可能的取向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继承前者而扬弃后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点与中国的务实主义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剥削理论。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相对简单，资本与劳动的分野比较明确；但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格局之下，资本和劳动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分配被证明是较有效的社会分配机制。中国的实践也表明，建立按要素分配的市场机制，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回归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来源：《文化纵横》，作者：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